

#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石敏俊\*

**摘要:**思考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必须完整理解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一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二是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重点解决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冲突,优先考虑可持续性;第二阶段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第三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当前,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尤其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课题:一是环境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二是环境管控与空间规划的衔接,三是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

**关键词:**绿色发展;两山论;资源环境可持续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全面阐述了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中国经济迎来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新时代。本文拟探讨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 一、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

###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绿色发展首先强调经济绿色化。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仅有物质财富的现

\*石敏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mjshi@ruc.edu.cn。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实现路径与政策创新”(15ZDC006)的阶段性成果。

代化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还需要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因此,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改善。尤其是当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存在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强调经济增长遵循自然规律,资源环境负荷不得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石敏俊等,2016)。即使放弃一部分经济效益,也要保证经济是绿色的。只有经济绿色化,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加快发展绿色产业,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发展并不排斥发展重工业。在粗放型传统发展方式下,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是高排放、高污染产业;但在清洁技术、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下,这些行业也可以实现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与绿色产业一样,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

## (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也要强调绿色经济化,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自然生产力也是生产力。当生态产品和环保活动能够盈利、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时,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环境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绿色食品研发等,都可能成为盈利的经济活动。绿色发展最终要使生态产品和环境保护活动有利可图,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绿色产业接力经济增长,对于构建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尤为重要,同时也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要保障。

思考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必须完整理解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以上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石敏俊,2017)。过去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冲突比较突出,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绿色化比较多,近年来绿色经济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构成了完整的绿色发展内涵。

## 二、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可以分三个阶段推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

### (一)第一阶段:“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当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强调经济增长要遵循自然规律,宁可放弃一部分经济效益,也要保证经济是绿色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各级政府推进绿色发展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

顶层设计,强调资源环境负荷不得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使资源环境承载力成为硬约束,构建环境管控倒逼产业转型的政策机制。其次,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强化环保督察,监督和规范企业行为,引导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必要时进行停产整改。第三,完善环境税制,合理确定各地区的环境保护税率,引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推行清洁生产。第四,倡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自觉遵守环境法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加强技术革新,可以减少生产过程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也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和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

## (二)第二阶段:“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需要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常保绿水青山,需要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绿色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是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具体来说,第一,要使环境管控发挥绿色发展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推进技术创新,走向绿色生产,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第二,鼓励发展绿色产业,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让绿色产业成为替代产业,接力经济增长。

从政策手段上,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成思危,2010)。一是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作用是降低绿色技术的成本,改善绿色产业的经济性。二是经济激励的政策,作用是通过激励性政策,使绿色产业有利可图。三是营造绿色产业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使生产活动符合环保要求,另一方面使符合环保要求的生产活动有利可图。

浙江省新昌县曾经由于化工制药产业为支柱产业,污染环境而引发环境纠纷,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地政府痛定思痛,一方面坚定推进环境整治,关停或搬迁污染型企业。2008年以来累计关停企业80多家,2010年以来每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20多家。化工制药企业搬迁到曹娥江下游的上虞化工产业园区。另一方面走创新驱动之路,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政府设立产业基金激励企业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20万元补贴。新和成、万丰等龙头企业纷纷设立研发中心,增强新产品研发投入,以新产品赢得市场份额。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化工医药产业占比从60%下降到20%,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占比达80%以上。浙江新昌的案例表明,通过创新驱动,可以有效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达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目标。

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作为绿色能源产业,既可以推动能源转型,又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前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遭遇弃风、弃光等发电并网的制约,标杆电价政策也面临执行中的诸多困难,亟需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发展瓶颈的制约。可再生能源配额加绿色能源证书是可供选择的政策创新。目前正在试行的自愿性可再生能源配额的政策力度不够,应尽快实施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加绿色能源证书交易的制度。

### (三)第三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是绿色发展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在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目标冲突,实现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目标之后,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就成为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让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成为自然生产力,使生态优势能够转化成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不仅要求优良的环境质量,也需要生态健康的保障。这就要求推动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让绿色产品、生态服务成为生产力。

在现实中,在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目标冲突之后,绿水青山并不能自动成为金山银山。我们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必须全面深化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

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当前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绿色产业的制度设计,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完善绿色消费的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绿色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让绿色、生态成为生活消费的新导向,使优质生态产品成为附加价值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得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然生产力;三是完善绿色金融的制度设计,使金融系统成为经济系统绿色转型的支撑平台;四是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 三、绿色发展理论创新的方向

十九大后,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论创新也迎来了新的契机。当前,绿色发展理论研究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课题。

### (一)环境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空间集聚意味着经济活动密集分布在局部地区。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集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空间集聚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加剧局部地区的资源环境负荷,甚至资源环境负荷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形成环境污染和环境质量恶化(石敏俊等,2015)。在现实中,空间集聚的负外

部性的案例比比皆是。无论是京津冀的雾霾污染,还是河川湖泊的水环境污染,均源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可以说,环境问题的发生与空间经济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规模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承载力的制约。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背后,与北京城市规模过大、资源环境不堪重负有着密切的关联。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转向绿色发展,也是受到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负荷过大的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集聚经济与可持续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发展目标的冲突。追求可持续性的环境政策可能会要求产业集聚转向产业转移,但由于集聚经济的作用,企业可能对鼓励产业转移的环境政策形成抵触,从而影响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反之,追求可持续性的环境政策可能会影响集聚经济的效率,带来集聚租金的损失。因此,有必要科学认识集聚经济与可持续性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寻找集聚经济与可持续性等不同发展目标的均衡点。这就要求推动环境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融合。

## (二)环境管控与空间规划的衔接

环境经济学理论的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技术创新将提高企业生产力,抵消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上升,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Porter& Linde, 1995)。大量实证分析证明,现实中确实观察到波特假说的现象,表明适当的环境规制将刺激技术革新,但也有的研究发现波特假说不能得到验证(王国印、王动, 2011; 沈能、刘凤朝, 2012; 原毅军、谢荣辉, 2016)。波特假说的检验结果差异的原因,有来自企业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政策工具异质性对企业行为响应带来的影响,而空间异质性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不同的区域,污染型企业对环境规制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响应。在区位条件有利、市场潜力大、盈利机会多的区域,企业面对环境规制会想方设法在当地留下来,从而会诱发技术创新,努力适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在区位条件不利的区域,企业面对严厉的环境规制时,往往采用搬迁或关门停产等办法,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适应环境规制。因此,环境管控需要考虑空间异质性,针对不同的区域类型,采取差别化的环境管控手段,才能兼顾经济增长及企业竞争力,达到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环境管控与空间规划的衔接,是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 (三)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

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盈利率低甚至负盈利、对政策扶持的依赖性强等特征,一般没有市场交易,也没有市场价格,因而不能成为资产。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要成为资产,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价值,二是具有明晰的产权(所有权或使用权),三是可以流转或交易。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或者环境价值货币化,体现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形成服务市场。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作为公共产品,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明确所有权或使用权。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市场流转,也是

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交易平台。

绿色食品和绿色生产的其他产品以及生态景观服务等具有正向的环境外部性,如果通过绿色认证的制度设计,使绿色、生态成为生活消费的新导向,绿色食品、绿色产品的环境外部性就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优质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就可以成为附加价值的组成部分,此时生态优势才有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大气是公共产品,但是空气中的污染物可以确定排放者和排放权,碳排放也可以确定排放者和排放权,因此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都可以进行排放权交易。规模养殖畜牧业产生的畜禽粪便排泄物会污染环境,虽然可以作为有机肥,但因为价值低,难以形成市场。日本、加拿大等国制定了规模养殖畜牧业排泄物处理的法规,明确了排泄物处理的责任,如果规模养殖经营者没有按照法规要求进行排泄物处理,将要受到罚款等法律的惩处。由于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规模养殖业排泄物处理就形成了服务市场,产生了委托服务的需求和提供服务的供给。

总之,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资产化的制度设计,也应当是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 参考文献:

- [1] 成思危. 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环境经济政策(第2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2] 沈能,刘凤朝.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2, (04):49-59.
- [3] 石敏俊等. 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轨迹——2005-2010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4] 石敏俊,范宪伟,逢瑞,陈旭宇. 透视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基于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的评价[J]. 环境经济研究,2016, (2):46-59.
- [5] 石敏俊.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N]. 光明日报理论版,2017-10-17(11).
- [6] 王国印,王动. 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对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1, (01):100-112.
- [7] 原毅军,谢荣辉.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6, (07):144-154.
- [8]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 [9] Porter, M. E. and C. Linde.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下转第92页)

## The Impact of Public Supervision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Zhao Wenxia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gulation enforcement, though costly for consumers and regulators respectively, take a great part in the level of compliance and pollution discharge.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inherent logic of drainage activities of firms and panel data of Chinese 30 reg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regulatory compliance which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liance cost like pollution density and the number of firms is also positively with the level of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deed negatively with the compliance level.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ould increase the marginal return of the enforcement, but public participation may have to rise with the slackness of enforcement when the level of their strategic interaction is less than the critical value. As the regulat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 grows continuously, the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public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execu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s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overnance need to call for all people governing together.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gulatory Complian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EL Classification:** L51, Q53, Q58

(责任编辑:卢玲)

---

(上接第6页)

## Several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Shi Mi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should include two aspects. Firstly, it is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The second is to make sustainability become invaluable assets. It means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should become profitable.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ree stages can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stage i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We should have a preference of sustainability to economic growth. The second stage is to ta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We need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The third stage is to make sustainability to be profitable. In other words,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have become invaluable assets.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should put attention to following issues. The first i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spatial economics. The second is link-up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spatial planning. The third is capitalization of green products and ecological service.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Two Mountain Theory; Sustainability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JEL Classification:** O13

(责任编辑:卢玲)